

第一章 三权鼎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出，武汉怒吼，全国震惊。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严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宣布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下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将蒋捕获归案，按反革命罪惩治，所部第一集团军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湖北省党部、汉口市特别党部、黄埔军校学生和各民众团体都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民党政府拿办蒋介石之命令。4月22日，宋庆龄、吴玉章、林伯渠、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何香凝、徐谦、汪精卫、朱培德、顾孟余、谭平山、于树德、经亨颐、恽代英、彭泽民、孙科等共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名义，发表了《讨蒋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贼。4月23日，30万人在武汉召开大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高潮。

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又开始酝酿下一步的反革命计划，把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召来南京。张静江、白崇禧、蔡元培、吴稚晖等均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来到南京。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谈话会，决定全面清党和奠都南京。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府，蒋介石

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的总司令。

国民党宁、汉对立的局面终于形成。从此 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中央政府 出现了 3 权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暗中加紧同英、美、日帝国主义勾结 并通过帝国主义谋求与张作霖的联合，双方互派代表，共同进行协商，联合起来反共反苏。南方的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亦不甘落后。3月1日 武汉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由汉口经过浦口时 与同行的苏联通讯员 3 人被直鲁军捕去 尔后解往北京审理。张作霖在北方开始捕杀共产党人。

4月初，李大钊避居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经常在夜间写文章，作报告，被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并通过法国使馆与日本使馆取得联系，通知张作霖。4月6日 张作霖指使奉军、警察厅出动数百人，强行搜查苏联大使馆及俄国兵营，捕去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 16 人，以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革命人士 35 人 李大钊也被逮捕。除苏联大使馆外 中东路局驻京办事处及远东银行也被搜查，奉军乘机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奉系军阀和教唆者英、日帝国主义者 不再谈国际公法“条约神圣”、“使馆界不可侵犯”的鬼话。许多洋人围观称快，有的摄取镜头。

搜查俄使馆事件发生后 苏联政府和苏联代办提出抗议 对此 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敷衍道：“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

这句话传到北京 生平最忌别人提“土匪”的土匪出身的张作霖 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骂：“外交人员怎么如此混蛋！”吓得内阁总理顾维钧急忙发电严斥郑延禧：“何得不问情由，擅发荒谬议论。”

张作霖本要撤换大发谬论的郑延禧，但又怕苏联乘此承认

南方政府而不再承认北京政府，因此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了了之。苏联代办切爱尔尼克率全体大使馆官员 30 余人回国。

张作霖在法、日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组织了一个军事特别法庭，派何丰林为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为主席法官，4 月 28 日判处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邓文辉、郑培明、莫同荣、李昆、姚彦、张伯华、阎振三、杨景山、范鸿、谢承常、路友于、莫华、吴平地、陶永立、方伯务、李银莲（女）、张挹兰（女）²⁴ 人以绞刑，即日执行。另有 4 人被判处 12 年徒刑，6 人被判处 2 年徒刑。李大钊临刑神色不变，和他一同牺牲的同志也都表现了舍身成仁的伟大气节。

李大钊等 20 余人遇难的消息传到潼关，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放声大哭，他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追悼活动，下半旗一日，中高级官长以左臂带黑纱一周。冯在电文中说：“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冯玉祥在电报中号召全军继承李大钊等革命者未完成的事业：“讨伐张作霖即是实行李大钊等 20 位同志未竟的志愿”；“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冯在潼关为李大钊等 20 位遇难者树立一纪念碑，用诗歌形式撰写碑文。

冯玉祥在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时曾通电营救：“本总司令对于张作霖此项秉承帝国主义意旨所出之空前横野行为，殊为愤慨。李大钊系国民党党员，本总司令所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 30 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

武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处于奉系军阀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两面夹攻之中，蒋介石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湖北。武汉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四川军阀杨森。在经济上蒋介石和各国帝

国主义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物资封锁政策，国内的资产阶级也采取了现金逃避的手段。武汉政府被迫颁布了“现金集中”命令，禁止现洋、现银出口，试图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商业纷纷停闭，物价疯狂上涨，日用品缺乏，失业工人人数骤增，5月间，武汉市失业工人达12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已开始自动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

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4月15日到达汉口。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连电催陈独秀去武汉。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都已在汉口，陈独秀是最后一个到汉口的。

陈独秀到达武汉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机关在汉口四民街61号临街的一幢三层楼洋房内，中央5位常委都住在那里，陈独秀的办公室由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3人组成。任作民、任秀兰是任弼时的弟弟和妹妹。

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们苦心焦虑，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4月2日，罗易来到武汉，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举行会谈，讨论革命形势问题。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陈独秀到达汉口后，由陈独秀主持。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应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发生了争论。有4种意见：(1)东征讨蒋；(2)南下重建广州政府；(3)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2期北伐；(4)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讨蒋 而主张北伐 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 则革命无法坚持。北伐可以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联通道。罗易则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

鲍罗廷说：“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 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 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鲍氏不惜以损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加上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也力主北伐 反对东征 这样 立即东征的主张被放弃了。

武汉政府于 4 月 19 日誓师继续北伐 向河南的奉军进攻，准备由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

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国民党中央于 4 月 2 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 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 4 月 19 日到 5 月 6 日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一些军事将领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4 月 27 日在汉口召开，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作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 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等

等。

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陈独秀批评的态度，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不得不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主要是退出国民党对北伐态度消极等。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陈独秀对一些有争议的策略上的错误，谈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中山舰事件，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上海武装起义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是必要的等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说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军队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应把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陈独秀没有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任务，没有夺取部队领导权的近期方案，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步骤。作为总书记，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已显得不称职。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内，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某些右倾错误，他思想很苦恼，心情不安得很。

陈独秀是这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心情也不轻松。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但对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和国民革命军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势力，仍抱有幻想。国民党中央否决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时，也没有进行坚决斗争。对国共两党关系不久破裂，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五大”选出 31 名中央委员，¹⁴ 名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一次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 7 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

延年、周恩来等 4 人。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组成，陈独秀任总书记。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极敏感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在 5 月 9 日和 12 日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国民党的主要头领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之后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在表决时只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吴玉章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举手赞成，但他们是少数，《草案》被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

5 月 13 日唐生智节制的第 14 师师长夏斗寅发出反共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夏斗寅率领叛军乘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北伐武汉空虚之际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 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

武汉危急，国民政府派由共产党员叶挺所部第 24 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 11 师前往镇压叛乱。叶挺的铁军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战无不克的威力，夏斗寅的部队留下几百具尸体而溃散。

李立三和蔡和森提议：由叶挺率本部及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铁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并开赴前线助战，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但他们的建议没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通过。罗易和瞿秋白都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陈独秀和鲍罗廷都同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和李立三也就没坚持自己的主张。

夏斗寅师由纸坊沿粤汉路南退后，蒋介石即收编为新编第 10 军。

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美其名曰“制裁工农越轨行动”，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即无异反革命”。

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刚刚发表，何键的 35 军 33 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武装叛乱 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

35 军大部分军官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书长、参谋处长全是 醴陵 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革命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何键曾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同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会，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

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 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 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反驳说：“恰恰相反 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

何键咆哮如雷：“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 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街了，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了 他们只有造反了！”

何键决定让他驻在湖南的 5 个团长 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歃血为盟 发动叛乱。33 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 性格粗犷 他的妻子是脱籍妓女 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地，许克祥早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 他得到何键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 什么农协会 我许克祥不怕 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5 月 21 日深夜，大雨纷纷，许克祥部以白袖章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 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

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连续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达 7 天之久，100 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24 日会议，再次发生争论，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讲，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 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发表演讲 反对鲍罗廷 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

蔡和森接着发言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咒骂民众运动的人，这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

接下是瞿秋白发言 他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 其实老鲍与罗易在根本原则上 并无不同……。”

两个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分别对他们提出批评，但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对两个外国人进行调和 并反驳蔡和森。

陈独秀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廷回答陈独秀说：“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而陈独秀并没说退出国民党以后该怎么办，会议以沉默态度答复了他的发言。中共中央已陷入了政治危机。

共产国际于 5 月下旬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历史上称为“5 月紧急指示”。6 月 1 日罗易收到这份电报。《指示》要求中共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 2 万共产党员和两湖革命工农 5 万人 编成几个新军等。

但是这个要中共建立军队的《指示》来得太晚，6 月 6 日，本来以左派面孔出现的朱培德在江西宣布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一天，陈独秀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5 月紧急指示”。他提出许多疑问：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建立军队之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陈独秀认为，国际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

政治局经过讨论，作出对国际“5 月紧急指示”的答复：“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把《指示》交给汪精卫并以“开诚”相见的态度对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 不然国民党左派同 C.P 都完了。”

汪精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几条，一条也不行 我们不能

牺牲国民党。”

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召集国民党将领，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要求军队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幻想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讨蒋，不惜作出最大让步，于6月28日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把部分枪支交给国民党，部分枪支转移和隐藏起来。

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问陈独秀：“报上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这件事你晓得吧？”

陈独秀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 现在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

陈独秀虽是这么说 他心里也很难受 常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究竟叫我怎么领导 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他陷入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6月30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 11 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当然的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 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是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把共产党仅有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

7月中旬，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同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 5 人组成政治局兼常委。

陈独秀不愿去苏联 并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 说辞职的主要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 实在没有出路 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第二章 “八一”战旗红

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那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阎锡山、冯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动。阎锡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产党人王瀛、朱志翰、张勋、王世益、赵秉彝、郭骤才、郭惠卿、王达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聂馨远、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杀害。

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击败奉军张学良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历史上称为“中原会师”。北伐军贺龙部于6月2日进占开封。武汉政府决定和冯举行郑州会议。

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于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5人赴郑州，冯玉祥也由洛阳抵郑州。冯到郑州时，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成员、军事将

领、铁路员工和闲逛的人群。冯检阅了仪仗队，以谭延闿为首的政府成员想走近他，但兴高采烈的铁路工人把政府成员挤到了一边 把冯抬起来 送进了轿车。

6月10日，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会了郑州会议 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汪精卫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拉冯”、“讨蒋、分共”。何键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 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30个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 有的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

冯对陕、甘地区工农运动本就有不满情绪，农民抗完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因而影响到国民军的军用征收，他又得知农民协会抗征兵、抗征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听松又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冯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 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现在又听了何键的话 对工农运动更加反感 因而在“分共”问题上 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不同意讨蒋 而是规劝武汉方面“息争” 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政治分会 指导豫、陕、甘 3省党务 以冯玉祥任政治分会主席 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承、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 并聘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冯虽然同意分共，但在政治分会成员中仍要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加。会议还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 归由冯严行编组 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 则一律撤回武汉整顿 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 既是为了镇压工农运动，也是为了东征讨蒋，原定打到北京的计划，半途而废。冯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 其总指挥分别是 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北

伐军以 1.4 万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果实 都落到了冯的手中。

冯玉祥还准备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但汪精卫收到陈某拍给他的电报：“冯已与蒋勾结好了 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你们。”汪便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其实，冯、蒋当时还未有那样密切的关系。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故意把蒋拉拢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 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郑州会议刚过 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

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经过来往电函多次联络 确定在徐州会晤。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占领徐州多时。蒋介石邀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专车来徐 共商一切。

冯玉祥从郑州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的列车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专车前来迎接。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 然而出人意料，“花车”车厢内并没有冯玉祥 而在“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门口，站着一位衣敝履的关东大汉，向欢迎者招手，众人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冯身着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军服 腰束布带 足穿土布鞋 与那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冯、蒋相见互相拥抱 还落了眼泪。

当晚蒋便设宴招待，在徐州各将领作陪。

6 月 20 日 在花园饭店召开“徐州会议” 吴稚晖担任会议主席。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蒋介石企图拉冯“反汪”和“反共”。但是 冯力主调解宁汉争

端，并说明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还说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婉言拒绝。蒋介石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吴稚晖代冯拟了《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经冯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报的内容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 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 继续北伐。

6月21日 冯向蒋辞行 乘火车前往开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他将军队中的共产党 200 人 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 40 人都调到郑州 先请他们吃饭 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

随后 冯玉祥送给刘伯承 1000 元 科长以上的每人 100 元，其余每人 50 元 用一个闷子车皮把 240 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又到西北去了。

冯玉祥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 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

但是 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 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电冯玉祥，要冯将鲍罗廷杀害。冯不仅对鲍不加杀害，反而仍以礼待之。当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西去时，冯率高级官员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罗廷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军乐大作，各人一一同鲍罗廷握手道别。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同鲍罗廷一起回国。冯玉祥派了高级官员 2 人一直把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返回苏联。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 1926 年 7 月以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火有苏联步枪 5 万支以上，日本步枪近 2 万支，德国子弹 2000 多万发以上，7.6 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近 5000 万发，大炮 50 门以上，山炮 12 门，迫击炮 18 门，炮弹 1 万发，机枪 300 挺以上，掷弹筒 1 万枚，手榴弹 1 万枚以上等等，总援助费用达八九百万卢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还没有投入那么大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援助。

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他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

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屈武等 22 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汪精卫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调往江西，作为江南东征讨蒋的部队。张发奎此时对东征、北伐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去，盘据在广州的是李济深的部队。

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掌握的力量较强。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二十军，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 25 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叶挺担任第十一军 24 师师长；当时还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担任第 20 军军长。另外，朱德担任第 3 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达 2 万人以上。这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仅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汪精卫集团“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对这些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张发奎已有让第二方面军的 C. P. 高级军官退出或脱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 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指挥。周恩来派聂荣臻赶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月20日 聂荣臻同转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 以及叶挺等举行谈话会，商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解决 3、6、9 军在南昌之武装 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号 并将这个意见报向中央。

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时共产国际又派罗米那兹来到武汉。7月24日 罗米那兹、加伦、周恩来、张国焘开会，会议根据周恩来和加伦的提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 立即南下 占领广东 取得海口 以取得国际援助 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会后 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 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会商，又决定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贺龙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早在 6 月即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 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他立刻热情拥护。

周恩来等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的南昌，于 7 月 27 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4 人组成 并决定在 30 日晚举行起义。不久 谭平山、张国焘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

28 日 周恩来到 20 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要我怎么干，就怎样干。”

贺龙、叶挺当日接到张发奎从庐山拍来的电报 请他们上庐